

宋代以后葛源镇的大族历史与社会变迁

游欢孙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系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自宋代以后,葛源镇逐渐形成了以周刘杨王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地方社会权力格局。明清易代、三藩之乱、太平天国时期,葛源地方社会均遭受了严重的战争创伤,但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传承机制却一以贯之。宋代以后葛源地方大族的历史,全息地反映了葛源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过程。

关键词: 葛源; 大族; 区域历史文化; 变迁

中图分类号: K295.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6)05-0090-09

The History of Big Families in Geyuan Town and the Social Changes Since the Song Dynasty

YOU Huansun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Geyuan town gradually has formed a local social power pattern around four large families (Zhou, Liu, Yang and Wang) since the Song Dynasty. During the period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anfan rebellion and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Geyuan town suffered serious war trauma, but it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historical culture kept consistent. The history of big families in Geyuan town has fully reflected the process of the changes of regional society, history and culture of Geyuan town since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Geyuan; big families; regional historical culture; change

1931年2月下旬,以方志敏为首的赣东北特区党政军领导在面对国民党军队进攻的辗转途中,最终选定横峰县怀玉山余脉磨盘山山区盆地中的葛源镇为赣东北苏区首府。从此,地处横峰、弋阳、德兴、上饶四县交界的葛源镇,成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关于此后葛源镇的革命史事,特别是其作为闽浙赣省“红色省会”的历史,已出的史料与研究多有勾勒^①。相对而言,我们对近代革命以前葛源镇的地方历史还知之甚少。本文即以葛源镇的社会调查资料为基础,论述宋代以后葛源镇的大族历史与社会变迁,希望能够从一个较长的地方历史角度,进一步加深对葛源镇的地方历史与近代赣东北革命之间关系的理解。

^① 参见方志敏、邵式平等《回忆闽浙皖赣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江西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关于江西苏区史研究的综述及最近趋势,请见王才友《50年来的江西苏区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收稿日期:2016-04-10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十二五”一般项目“横峰县葛源镇历史与文化研究”(编号:13CS19)

作者简介:游欢孙(1977-)男,江西乐安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地理与区域社会文化史。

一、由宋至明葛源地方大族的历史

在现今的葛源镇,民间一直有所谓“周刘杨王”四大家族的说法。从相关的史料来看,如果我们要追溯明代中叶以前葛源镇较为真切的历史,首先要提到的,便是其中的刘氏家族。清代同治四年(1865)刘氏第六次修谱之时,同为葛源四大家族之一杨氏族人杨仕藩就曾为刘氏作谱序一篇。序文当中有以下之评论:

虽然谱可以不序,尤有不可不急为序、详为序者,盖刘氏第一流人物,若白石先生之学术,泉山先生之宦迹,诸序更无一人道及,间有及者,亦拾人唾余。使无高陵编修吕仲木之一传,临川学士吴草庐之一志,则天人之理、圣贤之心,催运救荒、募兵殄贼、学问事功,不见于后世之子孙,即欲从而表章之,而无徵不信,亦与青山白云,同埋没于荒烟蔓草而已矣。然则吕编修、吴学士之传志,固谱中之一篇极大极紧文字。^[1](卷首《序》)

在杨仕藩看来,刘氏历代先祖之中,有二人最为杰出,一为白石先生,以学术著;一为泉山先生,以事功显。此二人均应该在谱序当中“急为序”、“详为序”。然而可惜的是,之前自明代弘治以来的刘氏历修谱序,均未予以大力表彰,幸亏谱中收录了吕仲木与吴草庐分别为白石、泉山撰写的传记与墓志铭,才使得二人的学问事功不致于埋没。

杨仕藩序中的吕仲木,即是吕柟,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学者称泾野先生,嘉靖六年(1527)升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尚宝司卿。也就是在嘉靖六年,吕柟应刘氏十世孙太学生刘旦之请,为刘氏迁葛源之二世祖刘养浩(即白石先生)作传。而临川学士吴草庐,则是广为人知的元代大儒吴澄,泰定四年(1327)曾应刘自谦(即泉山先生)长子刘埜的请求,为前一年(1326)去世的刘自谦撰写了墓志铭。相较而言,吴志撰于元初,吕传作于明中叶,前者比后者早出了整整200年,在时间上更贴近于刘氏始迁葛源之时,因而值得我们详细地分析。

吴澄为泉山先生刘自谦所撰的墓志铭,后来被收入到《吴文正公集》卷七十七当中,原文题为《有元徵事郎翰林编修刘君墓志铭》。铭文开篇有如下交待:

呜呼,自谦遽去予而歿矣夫,悲哉。予在禁林,自谦为属,南还之日,远饯出通州。明年将旨而至,澄老病,弗奉诏,遂别予去,未复使命,以疾卒于家。呜呼悲哉。卒之后一年,其孤埜触暑走六百里来求铭曰:将以今年十月某日葬里之江井山。^[2]

由此可以知道,刘埜请吴澄为其亡父刘自谦撰写墓志,是因为吴澄与刘自谦同在翰林院供职,有上下级的关系。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吴澄就一定熟知刘自谦的家世,于是接下来的一段交待刘自谦父祖身份的文字,当是自谦之子刘埜的诉说:

自谦姓刘氏,光其名也,住上饶葛源人,其先世初由彭城徙玉山大横塘,后家葛源。王考讳养浩,宋太学进士迪功郎,宁国府教授。考讳安,国朝将仕郎,湖广等处儒学副提举。

按照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刘氏后人刘英撰写的谱序记载,刘氏迁葛源始祖为宋大理评事“东白公”,此处的“养浩”,即白石先生,为刘氏迁葛源之二世祖,亦即刘自谦的祖父,“安”则是自谦之父“石泉公”。从东白公到自谦之子刘埜,前后不过五代,这样的一个家世交代,应该是相对比较真切的。

在交待了自谦父祖履历之后,铭文又历数了自谦的仕宦事功:

其仕南雄路儒学正,既满,游前翰林承旨姚公之门,勅授琼州安抚司儒学教授,待次,辟中书省断事官属吏,扈跸上京,分按诸郡,疑刑滥狱之久,悉白于长,决遣无滞。中书委催海运,不旬日,万艘集,民食日给。父忧解职,服阙之琼,以诗书礼义化荒服之民。广帅受诏捕贼,檄参军谋,固辞,帅入贼境,无可与议,驿邀请,不得已,募百余兵,诣帅垒,画计殄其渠魁,活协从之众万数。

按照这段记载,刘自谦曾先后在南雄、琼州、上京各地游宦,充任过各种不同的官吏角色。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曾担任过元初的海漕官员,并在琼州任上募兵谋军、参与镇压当地的盗乱,这就是前文杨仕藩所撰谱序当中所说的“催运救荒、募兵殄贼”。

接下来,铭文又记述了刘自谦自琼州回乡创办白石书院等事迹:

自琼归,创白石书院,祠朱文公,而黄文肃公配,以王考逮事文肃故也。分田贍养学徒,省为设额,行省为差官以教,公朝复加旌表焉。掾江西行省数月,不合,不留,选授将仕郎宝庆路总管府知事,未赴,徵补集贤掾史,继陞徵事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凡所撰述,辞采蔚然可观。

按照以上的记载,刘自谦的祖父“白石公”曾从黄干问学。自谦自海南归乡之后,曾创办书院,以白石为名,并祠祀朱熹与黄干,先后得到了元朝地方政府与中央朝廷的嘉奖。之后,刘自谦又曾在地方和中央担任过几种名目不一的官职,最后进入翰林院充任国史编修,从此成为吴澄的下属。

泰定三年吴澄为刘自谦所撰的墓志铭,是目前能从刘氏族谱当中读到的年代最早的文字。也正是这篇墓志铭,成为后来刘氏历代子孙演绎祖先故事、宣扬家族历史文化的最重要的一篇文字,其中关于白石书院的文字记载,也被反复收录于家谱当中。

在吴澄为刘自谦撰写墓志之后23年,亦即元至正十年(1350),时任白石书院山长的聂义方又曾写下一篇《广信郡守于太中修白石书院记》,其主旨固然是赞颂当时的地方主官兴学护学之举,但却也颇能显示刘自谦身后白石书院的情形:

白石书院创始自谦刘君,其嗣子朝任继之,先后割田以为贍学之费,然其地僻在万山间,土瘠租薄,赋役繁重,识者虑焉。义方备员于此,大惧祠宇之弗容,而教养之未广,然犹幸遇公之崇笃斯文,鼓舞作兴之意至勤也。期年即钁较生徒膏火之费,至欲使其讨论论磨,皆底于成,积而久取,书院瓦之破缺者涂墍之,毁败者毕治之,前立三门,周以垣墙,顾瞻一新。其大者栋宇四垂,凜然欲压,则又以其事请于公,公矍然命属县修理之,故书其概,复为诗以咏之。^[1](卷首《记》)

仔细阅读以上文字可知,白石书院自设立以后,刘自谦、刘朝任父子二人先后割置学田贍养学徒。聂义方充任山长之后,又曾请当时的地方主官于光维修书院。由此看来,前文刘自谦墓志铭内所谓“省为设额,行省为差官以教,公朝复加旌表焉”确实并非虚言。

毫无疑问,白石书院的建立,以及中央朝廷、地方政府对其的不断旌表,极大地提升了刘氏的家族声誉,以致刘氏自我标榜,后人提及葛源刘氏,均直呼为“白石刘氏”。嘉靖六年(1527),刘氏十世孙太学生刘旦请时任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尚宝司卿的大学者吕柟为刘氏迁葛源之二世祖刘养浩(即“白石先生”)作传。传文有曰:

宋有儒者白石先生,姓刘讳养浩,世居上饶葛源安辑里,大理评事东白先生之仲子也。勉斋黄氏倡道于闽,亟往从之。逾年,奔东白先生之丧,既服阙,不复起,隐居筑精舍于里之僻地,益肆力于道学,于是远近来从游者日益众,后以疾终于家,乡里士人感激化行,咸称白石先生云。其孙元编修光,为筑白石书院,事闻于朝,赐额,置山长,聂义方撰碑,泐然尚在。先生事载郡乘,祀之乡贤,不患不传之后。兹十世孙太学生旦笃学克肖,尚惧弗彰,属小子以传其事。去年时,旦谋修复书院,亦尝奔走百数十里以启厥事,盖闻风慕义,最深且久也。^[1](卷首《传》)

吕柟为陕西高陵人,嘉靖六年为官南京,平生足迹亦从未踏入葛源地方。正所谓名人作传,传主生平事迹的素材自然全系刘旦提供。从传记内容来看,嘉靖五年时,刘旦就有修复白石书院之举。虽然白石先生的事迹早已收入《广信府志》,并入祀乡贤祠,但刘旦还是担心先祖事迹年远事湮。“尚惧弗彰”,于是在修复书院的第二年,又特意请文化名人吕柟为白石先生作传,以垂之久远。观其传文所载,所强调的还是两点:其一,白石先生曾往福建从黄干问学,得程朱理学之正传;其二,白石先生自闽归乡后,曾筑精舍肆力道学,作育人才,远近从其游者甚众,以后白石之孙刘光更筑白石书院,朝廷为之赐额置山长,有聂义方所撰碑文为证。其基本用意还是在于经由白石书院以彰显刘氏的地方文化地位。

某种意义上讲,白石书院自元初创建以后,已经成为葛源白石刘氏的文化象征。而自嘉靖以后,白石刘氏的历代子孙,对白石书院一直修葺不辍,其文化大族的地位也长久不坠。乾隆三十四年(1769),裔孙刘起凤主持入清以后谱牒的第二次纂修,时任兴安知县张嘉庆曾为刘氏撰写谱序,其中就提及明末清初乱世当中白石书院的遭遇:

东白公仲子白石先生受业于先贤黄勉斋之门,道本程朱,名高理学。越二世,自谦公克绳祖武,奏建书院,即以白石颜其额。厥后年远倾颓,赖明信郡守于公葺之。洎(甲)寅、(乙)卯闽浦难作,豪强混据,遂成废址。至乾隆十三年,刘子不忍祖制之久湮,乃大集同族捐资罄助,落成堂构,且续割腴之地,以充絃诵之资,由是前人创建之规,后人缵承之业无费,燦然完备,而刘子之用心亦于是瘁矣。^[1](《卷首《序》》)

按照以上序文的记载,白石书院自创办以后,历经元明两代的多次修葺,最后毁于清初“三藩之乱”,直到乾隆十三年,刘起凤召集全族捐资重建,并续割学田“以充絃诵之资”。文中的“洎寅、卯闽浦难作”指的即是三藩当中的闽藩耿精忠的反清。据史书记载,耿精忠起事后,曾分东、西、中三路出兵,其中西路即攻江西广信、建昌、饶州一带。这样,葛源亦惨遭兵燹,地方为“豪强混据”。清代康乾之后的葛源地方社会,其实就是在明末清初乱世,特别是三藩之乱之后重建的。

二、“三藩之乱”及战后葛源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

据同治《兴安县志》卷八《武事》记载,康熙十三年(1674)3月,耿精忠在福州起事。4月24日,广信城守副将柯昇挟持标下兵目响应,夺城而出,由(广)永丰(即今广丰县)至二度关驻扎。5月,柯昇复遣将分路围广信府城,知府高梦说、同知侯七乘突围奔省请兵,于是广信所属七县皆陷。^[3](《卷8《武事》》)

关于当时葛源的地方情形,上引乾隆三十四年兴安知县张嘉庆所撰刘氏谱序已略有提及,但远谈不上详细。笔者在葛源当地调查时,曾得获见葛源街上王氏族谱,内中收录有王氏迁葛源二世祖“燠公”所撰《纪异谣》一篇,内中历数崇祯八年(1629)至清初康熙二十六年(1687)地方社会所发生的“异事”。以下即节引其中明末至康熙十七年部分文字,以见明末清初特别是三藩之乱当中葛源地方社会之情形(文中纪年之后年号与公元纪年均笔者所加):

细述自幼至老,但将所见因依。予生明季己巳(崇祯二年,1629),历观世事蹉跎。虽然难以枚举,大略记传人知。乙亥(崇祯八年,1635)洪水泛滥,粮田顷刻成溪。率人强搬稻穀,四方同日如斯。实系人心不古,诚为兆乱之基。甲申(顺治元年,1644)新朝受命,倏而定鼎于清。丁亥(顺治四年,1647)年逢旱魃,谷米贵若珍珠。八两石米无杂,粗糙糠粃和之。戊子己丑(顺治五年、六年)大乱,兵戈络绎不宁。土弁索人粮饷,遇者家财尽罄。悉在山坡隐匿,数载若无所伸。神虎咆哮出现,耕农种作忧心。又为瘟疫烂脚,命乘遭此殒身。不期天又淫雨,带糠升米四分。兵马会食人肉,盐肉钱六一斤。人民饿死大半,鬻妻卖子惨悽。少艾妇卖徽乐,无奈忍痛分离。剜却心头之窗,医得眼前之痍。幸际康熙圣主,壬寅(康熙元年,1662)之岁登基。在位虽然年少,风调雨顺十春。五谷分银石谷,四民咸颂年登。不意民苦为尽,赋役加派重征。埋怨祖父下德,遗此产业累人。衣衫首饰典尽,田园百物便宜。陡遇甲寅(康熙十三年,1674)之岁,闽地耿至复兴。遍地千百把总,游击参将日增。宦富被捆索饷,负穷绑勒充兵。随地相争鏖战,可怜白骨满州。无端咨肆淫掳,穉子带往无寻。丙辰丁巳戊午(1676-1678),四方绿林频兴。衣被遭为卷掳,日夜寝食不宁。乡乡房屋燬烬,村村路草丛深。幸遇天兵进剿,人民始得安宁。^[4](《卷1《纪异谣》》)

根据以上文字和王氏族谱的记载,王燠生于崇祯二年,顺治十一年曾中举人,时年19岁。《纪异谣》所记起于崇祯八年,王燠时年7岁,所谓“但将所见因依”,其实是后来王燠本人的真实回忆,因而可信度极高。从《纪异谣》的记载来看,葛源地方在明末崇祯八年与清初顺治四年曾连遭水旱之灾,谷米腾贵,但更糟糕的是顺治五年、六年的金声桓、王得仁的叛清所带来的地方动荡。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金、王叛清以后,清军曾自安庆发兵,渡江进占九江,并先后攻陷广信、饶州,围攻南昌。葛源地当广信与饶州之间,自然也是兵戈不止。土弁、虎害、瘟疫、淫雨、兵马等各种因素交织其中,葛源百姓困苦不堪,所谓“人民饿死大半,鬻妻卖子惨悽。少艾妇卖徽乐,无奈忍痛分离”,即是当时葛源地方惨状的真实写照。康熙登基以后,虽然一度风调雨顺,但清初役法繁重,田产成为累赘,家庭破产殆为常见,此即文中所谓“赋役加派重征”、“遗此产业累人”所折射出来的差役之重。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清起事后,葛源

又为其兵锋所指,于是出现了“遍地千百把总,游击参将日增”的情形。地方富户成为勒逼军饷的对象,贫困之家则被抓丁充兵,一时地方鏖战,遍地白骨。紧接其来的康熙十五、十六、十七三年,各路地方豪强也相继而起,此即前文兴安知县张嘉庆所谓“闽浦难作,豪强混据”,于是百姓“衣被遭为卷掳,日夜寝食不宁”,地方则呈现“乡乡房屋燬烬,村村路草丛深”的惨状。

三藩之乱后,各地社会秩序渐趋宁静,清代也开始进入了后来所谓的康乾盛世。战后葛源的地方历史就是在这样一种大乱之后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而对那些地方大族来讲,休养生息之余,着力培养族中子弟博取科举功名,在尊祖敬宗的名义之下编纂族谱、修建祠堂,就成为他们不变的内在追求。

乾隆元年(1736),白石刘氏裔孙刘蕴璧召集该族后龙、前街、义门三房合修族谱,从而拉开了三藩之乱后葛源地方大族纂修族谱的序幕。按照该年刘氏族人宏勳的说法,乾隆元年所修的族谱有“详、明、实、严”四美,洵为一时之良谱。^{[1](卷首《序》)}不过按照乾隆三十四年刘起凤的回忆,当时刘蕴璧开馆授徒,并无暇专注谱事,最终“谱经众手”,以致于“其谱前半自东白公至申字派十一世潦草旧谱以为首,后半自端至启九世,据各来稿以臆清,是以系图有书讳而逸字,书字而逸讳者,派行舛错有重写至一而二,二而三者,文籍至要者遗之,不必者赘之”。^{[1](卷首《序》)}最后该谱只以缮稿收尾,并未付之枣梨,刊刻成书。于是,乾隆十三年刘起凤捐资重建白石书院,并请兴安知县秦锡珩“勒石纪功,一时传盛蹟”。^{[1](卷首《序》)}之后又有乾隆三十四年再次修谱之举。

关于乾隆三十四年刘氏修谱,刘起凤又曾撰写谱序,详述其缘起:

吾于丙辰(即乾隆元年)阅稿之日,有速为纂修之志。戊辰、己巳,余又倡族复兴书院,以至延拦未辑。至丁亥、戊子之交,吾儿接踵备弟子员,承族赐贺礼,吾不敢受,吾儿曰:父夙志修谱,而苦无资,今承赐,盖收之以资谱费。余然其言,乃将原赐贺礼仍付各房知事者领回,而修谱之举遂决为己任。经营两载,稿本三易,至己丑八月而稿成,又与知事族长共相较政,众诺其可,然后付梓,至冬十一月而谱事告竣,择吉会宗,恭谒禅学,祭奠开谱。

按照以上记载,刘起凤自乾隆元年谱稿一出,即有不满之意,更有重纂之志,只是中间因乾隆十三年重建白石书院,财力均有未逮。至乾隆丁亥、戊子(三十二、三十三年),刘起凤之子相继入县学,阖族礼贺,刘起凤乃备酒答谢,席上各房房长与族知事并有捐资续谱之意。于是起凤乃以修谱自任,至乾隆己丑三十四年八月谱稿撰成,并付梓刷印。

谱事告竣之余,刘起凤更发如下之感慨:

吁嗟,抚家乘而抱愧,续遗编以增伤,遐想当年,盛耶衰耶,感怀此日,衰耶盛耶。今谱之修,予非敢云功,但阅是谱者念予之小心,咸以小心珍藏,培其根本,则祖灵默佑,合族繁昌,未必不由此一基焉,族之贤肖,其共鑑诸。

白石刘氏自宋代迁入葛源之后,历宋元明三代,簪纓无数,早已是远近闻名的文化大族。但自明末清初以来,包括刘氏在内的葛源大族迭遭变乱,故老凋谢,复兴需时。或许唯有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对刘起凤将宗谱纂修与祖宗荫佑、家族兴盛相联的用意,才能对其抱愧增伤之情,遐想感怀之形,略抒同情之理解。

三藩之乱后,葛源的地方大族除了修谱之外,也将祠堂的修建提上议事日程。乾隆十三年,白石刘氏三房之中的“后龙房”率先建祠,葛源街上四大家族之一的周氏族人岁贡生周汝登曾有如下议论:

考之礼,君子将营宫室,先立宗庙,以上则追远,下则联族,仁孝之道,莫此为大也。后世之人,但即所居祀其近祖,远乃弗及。然过墓生哀,入庙生敬,礼有同摄。诂丘墓在其乡,子孙聚其里,思敬宗者独可遗庙制乎?故準古酌今,就其便易,巨姓旧家于是乎有宗祠,宗祠与庙制,异名而同义者也。吾乡白石先生裔刘氏三宅,旧有家庙,久湮,后嗣谋恢复之,顾事举于力,独任则艰,议稽于众,协一则难。于是后龙一支首建小宗,为堂一户一,阶除廊室,规模粗具。既成,请记于予,予曰:是举也,可为刘氏三宅倡矣。盖不必庙貌崇隆,咸瞻刻桷丹楹之彩,亦庶几祖灵妥侑,得展秋霜春露之思,由此而推之人,知宗虽远,不可以偶忘,族虽繁,不难以竟合,其于仁孝之道,复何歉焉。祠与予居接壤,且目其子姓之经营功成不日,因为记以嘉其志。

云。^{〔1〕}（卷首《记》）

按照以上记载,白石刘氏作为一个诗书官宦家族,明代就很可能已经建立有家庙,但因各种原因,家庙早已湮没无存。但正如周汝登所言,明代中叶以后民间广为兴建的祠堂,与明代礼制当中所规定的品官家庙,其实是“异名而同义”,一开始也多为地方巨姓旧家所建。从“顾事举于力,独任则艰,议稽于众,协一则难”一句来看,后龙房一开始可能也曾邀约其他两房共建刘氏全族宗祠,但似乎并没有得到响应,所以率先建立了一座房祠。由于一房之力十分有限,后龙房祠只有一堂一户,只能说是粗具规模,但也得到了周汝登的赞赏,认为祖灵得妥,孝思得展,更可启敬宗合族之先绪。

乾嘉以后,地方大族修谱建祠日趋分化,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族内各房形成单独的利益共同体,公共事务很多是以“房”为单位展开,其中白石刘氏后龙房率先修祠已如前述,以下再看该族义门房修祠之情形。据宗谱记载,义门房的得名是因为“义门者,肇自泉山讳光公,即始祖石泉安公之子也,光公为有元延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创白石书院,建义塾,置义田,以贍乡子弟来学者,朝廷嘉其行,旌表其门,而义门立焉。”这是嘉庆二十三年义门房房祠建立时该支裔孙刘茂范的解释,从中已经可以看出大族之内各房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标榜的意识。但正如上文周汝登所言,“事举于力,独任则艰”,义门房房祠的最终建成,也颇经历了一番艰难。刘茂范的《义门祠堂记》清楚地记载了这一过程,记文有曰:

乾隆八年房祖邑庠能之公目击义门之貽,心伤宗祠之缺,尝竭己力,鬻分内田产以复旧基,为义门立祠,搆材度役,经营其概,奈天不假之年,有志未逮,基址虽存,而祠仍缺如,故凡我宗人,得毋靦青郊而洒泪,对白露而神伤乎。自嘉庆八年合房人等奋然相谓曰:建祠之举,不可废也。乃同商将廷芳公祀田租谷悬积数年,至十八年以悬积作费,通力建祠。时房孙作茂谊重敦伦,捐出洋钱五十五贯以助支费之不足,而吾等又恐基址狭小,不足以定規制,故将祖遗祀田壹墩,坐落土名二十都南洋坂,额租陆硕,换易后龙房基地,凑合前后栋宇,颇有祠室规模。无何,支费不继,艰于修理,厥多踧矣。迨二十年,我祖东白公八世孙派本行二十公流居泗水源者,其裔众来观是举,皆不禁惻然动念,遂躍然相告曰:我祖本义门一脉,愿重捐资费,共勦厥成焉。爰议立约,与为修理成功,所有列祖神主牌位,同安龕内无异。而作茂兄弟又捐田租二硕,并世贐公原祀租七硕,共计田租玖硕,以为祀产。^{〔1〕}（卷首《记》）

按照这段记载,早在乾隆八年,义门房内就有“能之公”挺身而出,捐献个人田产以作房祠基址,但最终“天不假之年,有志未逮”。到嘉庆八年,义门房众又将建祠提上议事日程,先是“将‘廷芳公’祀田租谷悬积作费,又得刘作茂捐资,之后房众又担心祠基过于狭小,‘不足以定規制’,于是又将义门房内一处祀田,换得本族后龙房基地,以成祠堂规模。但不久又因经费不足,无以为继。迨至嘉庆二十年,事情方得转机,缘因该年有一群来自泗水源地方的刘姓,自称是白石刘氏八世孙‘本二十公’的后代,本系义门房所出,看到义门房祠之建举步维艰,愿意捐资共建。于是义门房与泗水源刘氏订立合约,最终将房祠建造完毕。从记文内‘爰议立约,与为修理成功,所有列祖神主牌位,同安龕内无异’一句来看,泗水源刘氏的祖先牌位也一道放入了义门祠的神龕之内,这应该就是订立合约的核心内容。

总体上看,在乾隆、嘉庆以后,葛源地方的大族之内各房开始分化,各修房祠,小族则不遗余力地与地方同姓大族联宗,或与周遭同姓大族联谱,大小族之间都使出各种手段建构自己的家族历史与文化,一时你方唱罢我登场,太平世界,歌舞升平。然而,紧接而来的咸丰太平军乱,却再次打破了葛源地方的日久承平。

三、两遭兵燹:太平天国战时与战后的葛源地方社会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金田爆发,以后太平军出粤西、下两湖、陷九江、定都金陵,十余年间,中国东南半壁一直处在战乱当中。作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作战的主战场之一,江西在这场战争中受害极深,数百年来积累的民间财富被消耗殆尽,近代江西区域社会的整体走向也因此受到极大影响。这其中,包括葛源在内的饶州、广信二府,由于邻近安徽与浙江,更是战争当中的重灾区。关于这场战争的一般性描述文字,在战后同治、光绪年间所修的各地方志当中俯仰皆是,无需多赘。笔者在葛源

当地调查时,曾获睹葛源街上杨、王二姓族谱,其中王氏咸丰九年冬季续修族谱时,族人王家燮曾撰有《葛源遭兵纪略》(以下简称《纪略》)文字一篇,因其时距太平军第二次攻掠葛源(咸丰七年三月)仅两年半光景,故其对太平军进入葛源地方的记载最为详实真切。

据《纪略》记载,葛源由于四面环山,“人心质朴而褊吝,山水清秀而险隘”,太平军兴之时,“葛源固耕读自若也”。以后太平军溯江而上,围攻江西省会南昌,“其时葛地亦不甚惧,城市亲友颇有搬入葛源者”,葛源一度成为战争的避难所。

咸丰五年,葛源第一次感受到太平军的压力。该年2月,太平军由安徽进入到江西德兴县,由于“德兴距葛仅百里,朝发夕便至”,葛源一时人心惶惶。3月,太平军由德兴攻入弋阳,一度驻扎弋阳城内,后遭到清军进攻,又返回德兴。3月19日,太平军“又一支由德兴窜横峰,陷信郡”,后亦被清军“追回徽州而去”。这一年,葛源最终得以无事。

咸丰六年8月,葛源第一次惨遭兵燹。《纪略》对此记载甚详:

六年七月,贼由安仁窜广信,城内守御甚严,贼不得入。八月十八,退下横峰、铺前等处。葛源峙山高岭峻,并非通衢,竟无搬者。闻有搬者,人必笑之,以为其胆过怯也。是夕,但鸣锣守夜,遍地皆是耳。不料十九日贼由铺前分股,一股下漆工镇,一股窜葛源。黎明之时,有得确信而举家逃走者,旁观嘻笑自若,仍以为其胆过怯也。及贼众入村,尚有不知信者。是日殒命者数十人,被掳者大约四五百,鸡猪、衣物、银钱莫记其数。盖一日而穷矣。二十日五鼓,贼焚舒溪街店数十家,及大有桥之观音堂、紫气桥之关帝庙,遂拔营而去,由崇山往德兴,是日复有村内村外土匪大肆抢劫。及逃乱者回家,已是室如悬罄矣。谚云“贼兵如梳,土兵如篦”,真不我欺也。乱后议论不一,有议守者,有议战者,迄无成功。始议派钱探信,而以家燮之店为信局焉。^[4](卷首《记》)

从以上记载来看,太平军第一次进入葛源,是因为咸丰六年七月进攻广信府城不利,在退兵的路线上于8月19日攻入葛源。由于是黎明之际,葛源百姓躲避不及,所以“是日殒命者数十人,被掳者大约四五百,鸡猪、衣物、银钱莫记其数”,这个情景在咸丰十一年葛源杨氏修谱时族人杨学权所写的谱序当中也有反映。序文曾记载“咸丰丙辰(六年)八月十九,贼至自铺前,三千烟火起晨炊,百万虎狼直逼卧榻,张眸则烈焰冲霄,侧耳则哭声满路,衣裳在笥百留二三,鸡豚执牢十空八九,被掳者三百余人,丧元者五十余级”。^[5](卷首《序》)经过这次惨痛的教训,葛源地方开始设立专门的信探,信局就设在王家燮开设的店铺之内。

从第二年太平军再度进入葛源时的情况来看,信局对葛源士民的及时躲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纪略》记载,咸丰七年2月,太平军由安徽至德兴,由于“衣物等件去秋已劫尽,蔽衣破絮易于搬运”,“葛地逃窜一空”。之后太平军又由德兴过弋阳漆工镇,从弋阳、横峰往福建,“漆工镇过兵者七日”。葛源派出去的信探四面探听,以为可以幸免,不料3月7日太平军即由弋阳漆工镇转往兴安铺前镇,复由铺前至葛源回德兴,幸亏“探丁早回数刻”,葛源“地方被掳者仅数人”,只是葛源街“南市店屋及各乡房屋被焚者不少”,此外黄山底地方则因抵抗太平军,“遭害犹惨”。3月8日,太平军仍由崇山往德兴而去,此即太平军再过葛源之大略情形。

咸丰八年,太平军“由抚州至弋之南乡,及河口、铅山、广丰,以次至福建、衢州”,“过兵者廿余日,而信河以北无事”。7月间,太平军复“由玉山及郑家坊、姜李村往德兴,据景德镇”,葛源地方“亦尽搬移”。一直到咸丰九年秋,景德镇的太平军往安徽而去,包括葛源在内的赣东北地方才逐渐安宁下来。

咸丰六年与七年太平军两度攻掠葛源,地方社会惨遭摧残,葛源地方士民自然也是饱经战争的创伤。不过重要的是,葛源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传承机制,并未因这场战争而被摧毁。战争过后,葛源地方的各个家族又开始他们的续谱修祠活动,地方历史文化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重建。

首先来看白石刘氏的动向。前文已经提及,白石刘氏族内共分前街、后龙、义门三房,其中后龙、义门二房曾分别于乾隆前期与嘉庆后期建立起各自的房祠,从相关记载来看,作为族内长房的前街房的房祠在道光末年也已动议。对此同治四年前街房的刘启谟曾有《前街新祠堂记》予以追述,该文有曰:

后龙、义门皆有祠堂,而我独无,遂如晋人集新亭,相与歔歔泣下。予不自量,乃商诸众,权将禄公、都公祀租百余缗,随年支敛,又挨户捐资,照丁助力,力又有余,予之能成其志者,其在斯乎。经始于咸丰元年,落成于咸丰七年。尤可喜者,而我新祠堂如鲁国灵光,岿然独存,盖祖宗之隐为呵护者深矣。吾愿世世子孙不断书香,长膺科目,如东白公之为循吏,白石公之为理学,祠堂不更大有光哉。^[1]《卷首《记》》

按照以上记文的记载,刘氏后龙、义门二房于乾隆、嘉庆先后建立房祠,让作为长房的前街房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于是,前街房从道光庚戌三十年清明动议修建房祠,先后历经七年,最终将其修建完毕。从记载来看,后龙、义门二房房祠显然已经毁于太平军乱,而前街房房祠因最后落成于咸丰七年而得以“岿然独存”。所谓“祖宗之隐为呵护者深矣”,也只能说是前街房的祖先庇佑所致了,而希望后世子孙“不断书香,长膺科目”,多少还是显示出家族内部房派之间的竞争意识。

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社会地方家族编撰宗谱、修建祠堂,就不仅仅是为了尊祖敬宗与收族,更承载着祖宗荫佑、子孙发达的希望。对此,光绪二十四年白石刘氏第七次修纂族谱时,时人杨立三在谱序当中对宋代以来刘氏兴衰所做的一番评论就显得意味深长了。他说:

刘氏当宋元明时,盛已极矣,其难为继也固宜,乃自乙丑修谱而后,文人武士相继入胶庠,及俊秀策名成均者,较之三十二年以前,其数不啻倍蓰。异日掇巍科、膺显秩、学问勲业,方执前哲,当以此为权舆矣。昔由盛而微,今将由微而盛,则气运之将兴,宜序也。^[1]《卷首《序》》

在杨立三看来,白石刘氏在宋元明三代的发展,已臻于极盛,入清以后,则渐呈衰颓之势。所谓盛极而衰,本属正常。然而他又说,自从同治乙丑四年修谱以后的32年间,白石刘氏族中子弟接踵而起,又有强势复兴之迹。如果说同治四年的修谱,大致可以作为晚清刘氏重新崛起的一个起点,则白石刘氏修谱建祠、尊祖敬宗所带来的祖宗荫佑之效,似乎也日见其效。

然而,并非每一个家族都能像白石刘氏这样,能够有足够的底蕴在衰盛之间倏忽转换,强势复起。对于大多数的蕞尔小族来讲,互相之间联宗修谱,或寻求同宗豪右大族的庇护,似乎比祈求祖宗的荫佑要来得更加现实和直接一些。从相关史料来看,咸丰战乱后的葛源地方,同姓之间联宗建祠、共修宗谱的态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民国五年,葛源舒溪程氏与南市街程氏、枫林桥程氏一起“会修”宗谱,舒溪派第十六世孙程道曾撰《葛源新安程氏会修宗谱序》一篇,详细记载了三支程氏的由来,以及最后走到一起共同修谱的过程。按照序文的记载,舒溪程氏于明初迁自徽州歙县,始迁祖为“京公”。南市街程氏于明末迁自徽州休宁县,始迁祖为“文耀公”,枫林桥程氏则于清代康熙迁自徽州婺源,始迁祖为“有煌公”。因而三支程氏迁入葛源“为时之相去六七世,迁地之相距百余里,非深考诸谱牒,几不知为同支一本也”。而且在各自迁入葛源之后,三支程氏一开始各修各谱,毫不相关。其中舒溪程氏宗谱“创修于葛,续于葛”。南市街程氏“统修于徽(州)婺(源)”。枫林桥有煌公支则与弋阳程氏有燿公支合修于弋阳邵家坂。虽然三支程姓“居同地,籍同横峰,时祭同祖庙”,但“彼此转不相谋相联”,“势似涣而难合”。然而,同姓要变成同宗,其实又是很容易的。序文又记载:

然文耀,汧公之裔也,京与有煌,湘公之裔也,汧之与湘,又同怀昆季也。溯本寻源,皆珍公一父之子也,忠壮公一祖之孙也,其谊之宜合不应离可知矣。幸聚族于斯,无论为舒溪、为南市、为枫林,究其地皆属葛源,其祖皆来自新安,纂修谱牒,自不妨由分而合。矧自通户籍,建祖祠,已肇联合之权舆,则今届三支续修,势能萃涣者,岂偶然哉。^[6]《卷首《序》》

按照上文的说法,三支程姓共同生活在葛源地方,在通谱之前就已经“通户籍,建祖祠”,这就似乎表明他们在地方上已经合建了祠堂,而且极有可能在地方图甲户籍的编排上也存在紧密的关系,因而早已成为利益共同体。从这个角度来看,葛源三程最后在修谱活动上走到一起,是因为之前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铺垫,确实不是偶然而致。因此,三程将共同的祖先——忠壮公程灵洗抬出来为合修宗谱说事儿,只不过是再找一重理由罢了。

总而言之,咸丰太平军乱虽然重创了葛源地方社会,但传统社会文化的传承机制并未遭到破坏,战

后葛源地方大族继续分化,小族通过各种途径依附大族,或其它各支同姓联宗,共同续写着家族与地方社会的故事。然而,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清王朝的覆灭以及新式学堂的兴起,葛源地方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产生。可能谁也不曾料到,就在葛源三程会修宗谱之后十一年(1927),正是舒溪派程氏第十六世裔孙程伯谦在葛源地方组织了农民革命团,并参加了后来的“弋横暴动”,葛源的地方历史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四、结语

结合前文所揭葛源镇地处多县交界山区盆地的地理位置,地方富庶、人口众多的经济基础,以及明清易代、三藩之乱、太平天国战争当中的实际遭遇,今天我们站在事后的角度,似乎可以很“合理”地以葛源镇的传统史事,来“预见”或“总结”近代赣东北革命割据期间葛源镇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不论是以历史预见未来,还是以今日总结过去,终究可能会因预见或总结的目的过于直接,而过滤掉许多更为鲜活的历史。行文至此,拟以一个深受葛源近代革命影响的人物传记史料,来结束本文的写作。

1941年,葛源镇的王氏续修族谱,主修杨时风为早年同在饶州中学求学的好友王丹山作传,其中特别提到1927年底“弋横暴动”之后王丹山长期居外不归的原因:

先是,方匪未暴动前,多使党羽假国民党招牌,以打倒土豪劣绅各口号四出宣传。先生素性慷慨,疾恶如雠,闻其言,误以为实,而憬然从之。詎知渠等企图别有所在,恐大众不之信,特假国民党名义以相号召耳。其后先生悉其阴谋,乃毅然与之脱离关系,至是恐一不慎被逮,目为反动,遭灭顶之凶,故宁暂弃桑梓于不顾,而洁身以去。逮民十八年农历十月间,匪势且日益猖獗,先生乃复只身去之浙属建德县乡间舌耕度活。居建不三四年,以感身世飘零,侘傺无聊,极乏生趣,乃作厌世之想,终日醇酒妇人,无何,遂得咯血症以卒。先生卒年仅三十有五。^[7](卷首《传》)

站在维护旧秩序的立场,上引传文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失足青年”投身又脱离共产革命,之后又担心被国民党视为反动而逃离葛源,最终自暴自弃、客死他乡的生命轨迹。正如我们不能预料许多像王丹山一样的芸芸众生,在面对赣东北共产党人的革命宣传与号召之下将会作出怎样的人生抉择一样,我们也不能以前文所揭宋代以后葛源镇地方历史演进之“前事”,推论其在近代赣东北革命爆发以后之“后事”。或许唯有置身于近代赣东北革命的具体历史场景当中,仔细体味更多深受革命影响的个体生命史,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葛源镇传统历史与近代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及近代革命对于葛源地方传统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

(笔者在葛源镇地方的社会调查,得到横峰县政府及葛源镇杨李佳先生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 [1]白石刘氏宗谱[Z].同治四年.
- [2]吴文正公集[M].钦定四库全书(第119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3]兴安县志(同治十年)[M].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09号).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 [4]王氏宗谱[Z].咸丰九年.
- [5]杨氏宗谱[Z].咸丰十一年.
- [6]新安程氏宗谱[Z].民国三十三年.
- [7]王氏宗谱[Z].民国三十年.

(责任编辑:戴利朝)